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中的女性关怀

陈蔚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主旋律。七十多年来,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反思,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彰显。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不仅反思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反人性,还着重探讨和挖掘了女性在战争语境下的生命价值和审美理想。作家通过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肯定。《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西耶维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女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46-07

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三个浪潮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个主题贯穿始终。人道主义主题则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反思而逐步深化。重视人的价值和个性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渐渐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不可忽视的新的思想倾向。然而,作家们对作为战争中的“人”的组成部分和有着独特体验的女性的关注仍然较少。为了书写女性历史、为战争中的女性群体发声,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西耶维奇耗时四年,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苏联女性,让“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口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悲欢离合,表达对战争和生命最原始的感受和看法。作家笔下既没有贯彻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线索,也没有主观的心理分析,只留有女兵们朴实的话语和真挚的情感。《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摘取战场上最为细小的马赛克,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女性战争图景,诠释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苦难。而作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评价既谱写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新篇章,

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女性空白

由于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被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两大主题占据。苏尔科夫、列别杰夫·库马奇、西蒙诺夫等为首的一批作家以积极乐观的笔调大力歌颂苏联儿女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痛击法西斯邪恶势力的英雄事迹。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战争开始了苏联文学的新阶段……战斗中的人民在一次次流血奋战中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苏联文学在战争时期成为真正的人民艺术,传递出人民的英雄气概。”^[1]然而,众多歌颂战争中英雄的丰功伟绩和描绘胜利画面的文学作品虽富有极强的战斗号召力,却难掩自身对战争原因的深层思考和对人物内心情感挖掘的不足,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都有待提升。

在战火平息之后,随着斯大林逝世、第二次苏联

作家代表大会举行和苏共二十大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苏联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的思考逐步深入。以肖洛霍夫的“揭示了普通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2]的《一个人的遭遇》为起点,一小部分富有社会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重新审视哪怕被称为“正义”的战争,更多地挖掘战争的残酷性、荒谬性和反人性。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兰诺夫等人一反过去集中描写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喜庆场景的文学惯例,通过书写战争中平凡个体的不幸遭遇,揭示出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身心重创,让人们陷入沉思:当一个个平凡的人为集体、国家献出一切之后,集体和国家又该对他们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尽管从最初的概念化、片面性的框架和大肆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调走向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与肯定,但“从整体上说,战争的英雄主义题材始终被陈旧观念和陈旧的方式反复表达着,尽管有极少数作品对卫国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质疑,却很少有作家全面、严肃、深刻、哲理地重新反思这一场战争以及与其有关的众多理念。”^[3]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重视程度和挖掘力度与西方战争题材文学相比仍有较大的不足。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的送儿上战场、为孩子日夜祈祷的母亲形象,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照料家庭的妻子形象和对战事一无所知却充满美好希望的女儿形象既反映出俄国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和东正教思想对广大作家的荼毒之深,也体现出人们当下对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境遇所作思考和阐释的不够深入。哪怕是在极少数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里,如瓦西里耶夫的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鼓舞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女性形象的真实感与立体性仍较显单薄。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书中,尽管作家有意将作品的主人公由男兵改成女兵,但由于受男性视阈的局限,作家笔下的女兵的生命逻辑略显生硬和牵强。女性敏感、温柔、娇羞的天性一律被男主人公瓦斯科夫视为与军事操典格格不入的品质,而他对女兵们表现出的爱护有加、遗憾惋惜等态度表面上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实则却体现出其以自我为中心,对女性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作品中隐含的不

平等的男女级差观念使小说在表达人性主题时稍显乏力。而在名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虽打破了以往作家惯于刻画男性英雄和描写场面宏大、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的写作手法,但依旧难逃样板化、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意识和为国捐躯的政治号召使卓娅这一本该灵动有趣的少女形象迷失在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洪流中,成为了“高大全”的典型代表,沦为了政治宣传的强大工具。总而言之,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还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问题。女性在时代剧变语境下所独有的心灵体验与感悟仍是一个问号。在绝对理念的驱动下,作家们忽视了对战争中的女性生存境遇和精神成长的挖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仍存在不少空白。

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从俄国文学诞生之初到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蓬勃发展,俄国女性除去作为男性视角下被创造出的空洞能指外,始终未能获得“真实”的解放。随着农奴制废除、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再到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以及苏联国内人权运动的兴起,俄国女性运动一路高涨,妇女们渐渐走出家庭,接受教育,投身社会变革,女性意识强势觉醒。以阿列克西耶维奇、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丽茨卡雅、托尔斯塔雅、托卡列娃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20世纪下半叶正式踏上历史舞台,由此打破了俄国文坛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她们从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出发,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自觉地探寻俄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性别意义,逐步丰满了女性符号的语义内涵,彰显出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其中阿列克西耶维奇以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基础上,揭露女性苦难、书写女性史诗的创作手法独树一帜。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看似只是一部战争中的女性的回忆录,实则却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精心构筑的一部反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命运的作品。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冷峻风格详细地描写了苏联女性在战前、战时、战后所经历的种种折磨与苦难,将战争的恐怖与性别压迫的残酷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如阿列克西耶维奇本人所述:“承受苦难是一门艺术,必须承认,女性是有勇气踏上这一历程

的……”^{[4]408}

在战前,面对兵力紧缺的困境,女性们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于战场。有不少女兵都是跟随自己的爱人、父亲或兄长的步伐,抛下原本宁静的生活,拿起武器,瞄准敌人的头颅。女飞行员邦达列娃为了追随第一批就上了前线的丈夫,留下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申请作战。狙击手丹尼洛夫采娃则为了和心爱的人一同奔赴战场放弃了成为一名演员的梦想转而学习射击。残酷的战争迫使女性将男性那付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了自己柔弱的肩膀上,走上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她们出于家庭责任感和宗教信仰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道德力量令人肃然起敬,却也同时反映了在父权制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之下,依靠和追随男性、甘愿放弃个性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女性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战争中的女性盲目地从“追随”中提炼出一种“幸福”,将与男性同生共死,为男性赴汤蹈火看成精神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

在战时,尽管作家笔下的女性有着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但从她们的叙述里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共同点,即从踏入战场的那一刻起,大多数女兵便下定决心与“自我”中的女性化特质决裂,力图与男兵一争高下,建功立业。女兵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4]23};面对战场上男兵们的冷嘲热讽,她们则时刻要求自己:“比男兵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不比男性差”、^{[4]235}“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4]62}从表面上看,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对战功的向往体现了女兵们积极上进、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却从深层反映出女性内心深处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生存,才能赢得与男人的“平等”。父权文化虽早已日益丧失了它的外部约束功能,然而它却深深地渗进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引导着她们做出一些非自觉的归顺于父权压迫的价值判断。

尽管女兵们始终秉持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坚定信念,但一些专属于女性的个性却会在战争这个特殊场景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使她们不得不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做出更为惨烈的牺牲。首当其冲的便是母性的撕裂与分离。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论述的那般:“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生存。”^[5]

对孩子自发的热烈的爱是一切母亲的本能。然而为了完成任务,身为母亲的联络员拉丘卡维奇不得不将战争物资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甚至不惜“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4]48}以求通过关卡;游击队的女兵切尔诺娃怀着身孕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母性的撕裂给战争中女性的命运添上了一抹更浓厚的悲剧色彩。其次被摧残的还有女兵爱美的天性。在战争中,“不管女人们简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是说到死,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4]216}对于射手阿赫梅托娃而言,“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士内裤”;^{[4]73}洗衣姑娘们则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指甲脱落;步兵斯特洛采娃竟会在同伴不幸身亡后发出惊叹:“她躺在棺材里是那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4]216}对美的格外关注与追求使战场上的女兵有别于漠视一切、冷静理性的男兵,经历了更多的挑战,深陷在美与摧毁一切美的战争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除了母性和爱美的天性,女兵们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求是她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个性。2013年莫斯科时代出版公司再版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几乎是作者的重新创作……作家把许多曾被报刊检查部门禁止或被迫自我删去的内容发表了出来,率直地写出了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都让人噤若寒蝉的话题,比如战争的残酷,战争中的女兵感情和男女关系……”^{[4]441}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爱情常被认为是一种隐秘地被埋藏起来的“糟粕”。女性个人的命运一旦与社会变革力量结合起来,以爱情为代表的女性的个性意识总会被“革命意识”或“民族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描写女兵对爱情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以彰显女性的个性意识,宣扬抗争精神,呼唤个人自由,从而打破了爱情外面罩着的冠冕堂皇的革命主义外壳,用爱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权话语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一系列案例揭露了战争中爱情悲剧的实质:男人与女人对爱情乃至整个人生追求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战争中的女性比男性少了选择,多了负担。不少女兵甘愿为男性铤而走险、放弃自我,而男兵们的感情则显得相对短暂和凉薄。许多男兵为了逃避责任或是保持自我的完整性而竭力挣脱女人意愿的缠绕,战争一结束就抛弃了自己战时的伴侣,另觅他人。男女两性在对感情和人性的理解方面的隔膜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进一步

加深。女兵们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承受着一种绝对的困惑和悲凉。

胜利的钟声敲响,女兵们本该在战后迎来幸福圆满的大结局,殊不知,苦难的梦魇却仍不愿离去。男兵们享受着鲜花与荣誉,沉醉于回忆往事,对自己英勇杀敌的传奇故事津津乐道,女兵们却不得不“像鱼儿一样沉默,谁都不承认自己在前线打过仗”,^{[4]125}有的女兵甚至会因为佩戴了和男人一样的战争勋章而遭到质疑。战场上的胜利仿佛只属于男性,女兵们则拖着残疾的身躯,神经衰弱,噩梦连连。除了肉体上的伤痛,女兵们的心灵也承受着巨大的打击。战后,男性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她们,只愿与未参军的女性约会、结婚;连那些本该给予更多包容和体谅的同性也对她们大加指责:“女人们就都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用你们的年轻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4]295}直到过了几十年,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在《真理报》上写到这些孤立无援的女兵,提出她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4]109}人们才多多少少对这些参与过战争的女性予以关注。残酷的战争使女兵们的内心发生了异化。怯懦与勇敢、绝望与希望、世故与单纯、冷漠与温情,在同一个女兵身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与品格。而战争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给女兵带来的异化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永恒的孤独。这份孤独包含着双重意味,一方面,它触及到女兵的生存和精神处境。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被时间遗忘,化为历史的尘埃使女兵的孤独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女兵自我的选择。面对社会风气的改变,面对人民对战争的看法的改变,一些女兵“不肯脱掉军大衣”,^{[4]182}甚至选择以独居的方式反抗异化的社会,拒绝异化的话语,以孤独来表达社会意识形态力图抹煞的女性的个性。女兵的异化与孤独标志着战争语境下女性和个性的双重受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绝非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并未否定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确捍卫了俄国神圣的国土和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但战争的胜利也掩盖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尤其是女人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作为一个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意图消解国家和阶级层面的战争观,通过揭示战争的最广大

参与者,也是最直接受害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无助与无奈,重塑人类共同的战争观,即战争是对个体价值的否定与撕裂,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践踏和扭曲。作家也并非一个眼中只有苦难与不幸的悲观主义者。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看来,苦难与生命的奥秘有着最直接的联系。通过搜集和记录苏联女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苦难事迹,阿列克西耶维奇意图揭示出女兵们所承受的伤痛不仅来自于战争本身,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也是令女兵们陷入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一悲剧性的主题。历史的前进、胜利的到来掩盖了女性的苦难与功绩,浸润着性别压迫策略的文学传统也将鲜花与掌声献给了浴血奋战的男性。阿列克西耶维奇以一种新的艺术真实证实并阐释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未曾书写过的女性苦难,揭示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层悲剧性。

三、深切的女性关怀

阿列克西耶维奇以直白的笔触血淋淋地揭开了掩埋在胜利之下的女性之殇。正视历史与伤痛、肯定和赞颂女性在战争中的顽强奋斗和巨大贡献是作家和女兵们的共同诉求。作家从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三个方面入手,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对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平等与爱的世界的向往。

俄国自19世纪以来,一大批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文学大师争相涌现、一部部闻名遐迩、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令世人折服。俄国作家笔下那一系列温婉动人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人性的典范的理解,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中国人的理想是智者,印度人是苦修者,罗马人是统治者,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是贵族,德国人是士兵,俄罗斯人的理想则是妇女。”^[6]然而在千年父权制社会和古老又根深蒂固的东正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俄国女性意识长期处于被压制甚至扼杀的困境。作为现实生活里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的投射,俄国经典文学中为人赞美和歌颂的“理想女性”形象总是具有温顺、忍让、宽恕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到《贵族之家》里的丽莎,再到《活尸》中的露凯丽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一直延续至拉斯普京创作的纳斯焦娜,男性作家往往将笔下的正面女

性人物塑造为精神救赎的化身,在她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审美、宗教和道德理想。“理想女性”大多笃信上帝、乐于奉献、拥护宗教禁欲主义精神。从这些在男性身边总是默默无闻、温顺忠诚的“附庸品”角色身上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女性形象的原初所指即便有过,也被偷换抹煞了……被偷换成物,偷换成雌伏于人的、从属性的‘地位’,或从属性的文化等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劳拉·莫尔维语)。”^[7]男作家们认同和赞美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本身,而是延续千年的父权文化为女性所规定的职能。

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一个个女性形象已褪尽了俄国传统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完美与柔弱。严酷的战争将人性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弱点与矛盾通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坦克兵、机枪手、火车司机、拖拉机手……战场上的女性不过是一群有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顽强的求生欲望的普通人。她们时而顽强拼搏、英勇杀敌,时而迷惘彷徨、失去前行的方向。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记录战争中一个个极富个性、活泼生动的女性的故事,打破了俄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刻画出一幅光辉夺目的艺术群像。由此,我们对战争中的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的精神状态有了更透彻、更本质的了解。

除了重塑女性形象,阿列克西耶维奇还积极建构女性话语,为战争中的女性争取话语权。依据福柯“话语即权力”的理论,话语和权力不可分割,话语是掌握和运用权力的关键。传统社会中男性牢牢地把持着话语权,建构起各式四处渗透的权力,以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女性在年复一年的沉默中,被驱逐到话语的边缘,沦落至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为了跳出传统男性话语的牢笼,寻找女性话语的重构方式,阿列克西耶维奇首先严厉抨击了传统男性话语的片面与阴暗。她不仅多次在自己的创作摘录中表达了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传统男性话语的不满,还借用女兵之口控诉了传统男性话语的冠冕堂皇:卫生指导员杜布尼亚科夫嘲讽战争影片中穿得整整齐齐的护士形象;冲锋枪手柳步契克则诉说着自己对战争书籍和英雄书籍的厌恶;而战地军医扎贝利娜直接使用“虚假”^{[4]245}一词控诉传统男性话语操控下的战争书籍和影片。真实的战争远不是一两个男性英雄迅速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的童话故事,而是由一个个女性的“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

肮脏不堪,衣衫褴褛”^{[4]51}拼接而成的心酸血泪史。而通过几次穿插不同的女性在接受采访、回忆往事时被身旁的男性打断、指正甚至责骂的细节,阿列克西耶维奇揭示出凌驾在战争这一阴性名词之上的男性霸权。

接着,作家积极响应法国女思想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提出的“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号召^[8],以女性的身体为载体来描写女性在战争中的独有的体验,打造出属于女性的经验世界,从三个方面解构了俄国文学传统的男权话语体系:阿列克西耶维奇先是毫不留情地扒开男权制度为男性打造的强权铠甲,通过塑造一系列比男性更勇敢和进步的女兵形象和穿插战场上女救男的情节,犀利地揭示和嘲弄了一部分男性自身的虚伪、软弱和无能;其次,作家采用与大多数男性作家史诗性、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把目光集中于女性私人的生理和心理世界,将女性意识隐藏于字里行间,以充分的个人化、碎片化、情绪化和反逻辑化叙事实现了对男作家严肃、理性的叙事方式的解构。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有在战场上第一次经历初潮却误以为自己受伤了的少女侦察员汉吉穆洛娃,有虽然饥肠辘辘但仍把鸡蛋打碎用来清洗靴子的工兵排长沃尔科娃,还有偷走男兵衬衫用作女性月经用品的通信兵卡贝尔达。

通过挖掘这些独特而私密的女性经验,作家将女兵们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而通过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描写男性的一举一动,则将战场上男性的真实行为与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阿列克西耶维奇由此又解构了以往男性作家笔下男性士兵趋向英雄化、模范化却苍白无力的创作规范,将男性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活和立体;除此之外,阿列克西耶维奇还描写了大量女兵之间的同性情谊以解构传统的异性爱情神话。在小说中,男性并不是女性获得精神满足和实现自我成长的唯一源泉,同性间的相互扶持和鼓励是女兵们积极向上,英勇作战的不竭动力。在骑兵连一起担任卫生指导员的瓦西里耶夫娜两姐妹相互扶持、齐心协力,在战火中分离又重逢的故事感人至深;而对被盖世太保迫害致死的女性战友们充满敬意的地下工作者维列夏克时刻不放松警惕、英勇奋战;柯娜柯沃城五姐妹在战场上一同出生入死,最后却只有维什涅夫斯卡娅得以存活。而她自己独活的意义便是给后人讲

述那几位亲如姐妹的战友的故事。尽管战争的黑暗与残酷令闻者伤心、听者落泪,但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对极端环境中美好人性的挖掘与讴歌和女性群体自强不息的美好品质的描写,从谴责暴力、反思战争的基本思想上升到了关怀生命、关怀全人类的高度。女性人物在苦难中的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毅力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再次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与阿列克西耶维奇设想的不同,苦难与血泪并未带给女兵自由,反倒成了束缚她们的枷锁。在接受作家的采访时,有的女兵不愿回忆往日的辛酸历程,生怕再次陷入痛苦的泥沼、难以自拔。有的女兵则选择美化过去,如做公开的演讲般“将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4]101}甚至有时从同一个女兵身上,作家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阿列克西耶维奇对尊重和敢于回忆的女性持肯定态度,赞扬她们珍藏过去的相册、保留战争留下的勋章的做法。而对那些“企图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换和替代生活本身”^{[4]101}的叙述人,作家则通过运用不同的谈话方式、设置不同的问题等方法引导她们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归最真实的自己。被采访女性在回忆往昔的过程中反复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阿列克西耶维奇对女性历史的寻找与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同步展开、相辅相成,女性在战争中的精神成长轨迹和伟大功绩愈加明晰。而在帮助女兵们“除掉无用的岩层,找到闪光耀眼的金子”^{[4]86}之后,作家又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选择、人物及其叙述的筛选和排列、角色和环境的统筹和描写等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战争中的女性的精神谱系,将战争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自我的成长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既是一部女性心灵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战争与女性的关系的演变史。通过追溯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变迁,阿列克西耶维奇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肯定与赞美之情,对战争的残酷和顽固的父权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抒发了对爱与平等的向往与呼唤。

一直以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男性士兵饱含关注和关怀,却遗忘了正是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才诞生了一批新的阴性名词。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解构了传统的男性话语,为女性发声,并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故事汇聚成了一座英雄史诗。《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以对战争中的女性的深切关怀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长廊中熠熠生辉。

四、结 语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植根于世世代代俄国人的记忆之中。七十多年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创作历久弥新,展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越来越多的俄国作家逐渐超越民族文化和阶级立场的视点,崇尚人性,敬畏生命,发掘蕴藏在普通个体身上的美好价值。阿列克西耶维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文学传统,运用“阴性书写”,结合女性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经验,向前更进一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在战争与父权制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女性群体,对战争发出了更为深刻的质疑与责问。正如瑞典文学院写给她的颁奖词一般:“她的多声部书写,是纪念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9]

作家笔下鲜见宏大的枪林弹雨,多是女兵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强调平凡与伟大的统一,女性与人性的和谐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最终诉求。作家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为战争中女性争取言说权利的尝试,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 [1] Толстой, А. Н. Собр. Соч. В 15 Т. Т. 14 [М]. Моск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0: 346.
- [2] 吴萍. 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嬗变[J]. 俄罗斯文艺, 2015(1): 62-67.
- [3] 张建华. 战争英雄神话的消解: 后苏联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中的思想向度[J]. 外国文学, 2010(5): 39-48.
- [4]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 [М]. 吕宁思,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 [5] 波伏娃. 第二性 [М].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550.
- [6] Рябов, О. В.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софии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0 (3): 28.
- [7]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М].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1.
- [8]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М].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88.
- [9] Nobel Media. Svetlana Alexievich-Facts. [EB/OL]. [2017-12-31].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5/alexievich-facts.html.

Deep concern for woman in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War's Unwomanly Face*

CHEN Weiqing

(School of Russ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Nationalism and heroism are the main themes of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As Russian writers have comprehensively rethou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s and huma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has been shown in more literary works. In her *War's Unwomanly Face*, 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 not only reflected on the cruelty and anti-humanity of the war, but also explored women's life values and aesthetic ideals under the context of war. The author expressed her deep concern and high affirmation of women in war through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shaping mode, reconstructing female discourse and composing female spirit. The work *War's Unwomanly Face* fills in the blanks of female history in Soviet Union's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and lifts the humanitarian spirits embodied in the literature to a new peak.

Key words: *War's Unwomanly Face*; Alexievich;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woman

(责任编辑:任中峰)